

## 前 言

过去的十余年，俄罗斯国家和民族是处于世人惊叹的连接不断的变化之中的。正如 A·布兹加林所言：“所有的都不再是已习惯的，一切都在变化，社会和旧的思维陈规相剥离，但并未找到避免精神和物质上危机的出路。”<sup>①</sup>俄罗斯的教育也有大致如此的命运和历程。因此今天描写这个国家的教育就如同描写一条奔流不息、不断变化的河流一样，这意味着围绕着这个时期所写的许多，在日后的不久就可能需要我们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它们，用新的词汇去描述它们。

教育变革是现代世界变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最庞大、最基础的部分，它不仅是现代国家保证公民接受教育权利、实现教育公平的教育保障体系，同时也是为现代社会提供拥有一定科学技术和劳动文明素质的基本劳动力的最重要渠道。

<sup>①</sup> A·布兹加林：《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学》第 234 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年。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基础教育改革一直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中的主要阵地。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更是将其作为核心看待。原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也不例外,从原苏联到今天的俄罗斯,国民正规教育体系基本上都是由学前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几部分构成的。而学前教育、普通教育(普通中小学教育)和初、中等职业教育作为苏联和俄罗斯的基础教育的组成内容,从二战以来的教育发展来看,几乎每每成为社会和教育改革中政府和社会最为关注的对象,从而一直都处于改革的最前哨。

从比较教育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的基础教育变革与发展,既是世界基础教育大变革的组成部分,它有着宏大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文明变迁的背景,同时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有着民族的、政治和经济的时代发展背景。因此,在研究俄罗斯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到如下两个关系。

## 一、如何看待苏联时期教育与俄罗斯教育变革的关系

1991年,存在70余年的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了,由89个主体(其中包括21个共和国、1个自治州、6个边疆区、10个自治区、49个州和两个联邦直辖市)120个民族组成的俄罗斯联邦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主权和遗产,重新以国家主体的身份进入到现代世界国家的行列中来。在短短十余年的迅速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社会的各个领域,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治理理念、社会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还是价值观念体系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作为社会文化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同样经历着社会急速转型所生成的各种矛盾、冲突以及重新选择和定位的阵痛。这种冲突和矛盾来源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型,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的选择,它的影响会辐射到经济制度和治国

理念的选择，同样也会影响到对教育道路的选择。作为一种具有自在的生成机制和运行规律的社会现象，俄罗斯的教育并不会因为苏联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的解体而使“苏联教育模式”完全消解或消亡，但是，由于教育总是要受到政治和社会文化变化的影响，因此教育方针、教育指导思想、教育理念、教育理论乃至具体的管理方式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相应的变化。

对待苏联教育向俄罗斯教育演进的过程，人们的评判存在着种种可能的偏见。给这种转型以鲜明而又客观的定位或评价，这是许多研究俄罗斯教育的人们的基本出发点和目标。但在事实上，不仅是国外的各方人士见仁见智，即使是其国内民众也是众口评说，见地纷纭。真正中肯、客观的评价在哪里？是否真如俗语所言“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尽管有种种政治压力与政治影响 苏联仍然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教育制度，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得以造就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 而全体人民则成了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之一 这些事实是不应忽视的。令人遗憾的是，后苏联时期的许多学校改革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苏联时期的）教育制度曾被迫屈从过的那些政治压力上，而对种种好处视而不见。但苏维埃学校教育依然是一个成就，不仅对俄罗斯文化而言，即便就整个世界文化而言也是如此。”<sup>①</sup>

我们在总体上对苏联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停滞期作出消极评价时，不能不指出，这一时期它仍然能够创造出某种最起码的正常的社会福利水平，它比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低，但在主要参数方面（不仅包括食品消费，更包括保健服务、教育和文化的消费）

<sup>①</sup> В·Д·沙德里科夫：《俄罗斯联邦 教育的人本主义化》载《教育展望》（中文版），104 期。

仍然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之间最领先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它证明了现实苏联社会主义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是与这样一种情况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即苏联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和教育、文化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要比农业、工业基础设施或服务的发展水平的差距要小。换言之，稳定的福利、教育等经济目标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我国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某些成绩，是与存在着一个有效的生活保障体系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体系能够保证所谓的对未来的信念、稳定的就业、最低工资保障、住房、休假、医疗服务和教育体系——所有这些创造了某个支柱，它以可能使更多的人享受更体面的高等教育为目标，并且力图使他们从事创造性活动。”<sup>①</sup>这是我们评判俄罗斯教育模式转型过程中所应该看到的一面。

相对于苏联时期稳定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发展历程，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俄罗斯社会在写满“不确定”字眼的空间里，时而保守 时而激进 时而沉默 时而亢奋。政府如此 理论界如此 基础教育改革乃至整个教育的改革也是如此，在一半清醒一半迷茫之中，寻找着转型变革的出路。在教育研究领域，人们企图寻找一种有别于苏联时代的教育，但文化特有的历史传承性却让他们无法割断与那个时代的“一脉相承”外壳可以随时换取 可是内核却仍是一如既往地生长着！那是让国人曾自豪、让世人曾羡慕的伟大成就。他们中也有人试图干脆利落地把西方现成教育模式拿来，却发现那是在别人土地上结出来的果子——“橘逾淮则枳”。有人（Я.С.Турбофский等）在研究俄罗斯 90 年代的“教育目的

<sup>①</sup> A·布兹加林：《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学》第 160 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年。

说”时发现，在当时国内教育科学文献中对“教育目的”这个概念的定义竟达三十余种！一国“教育目的”之界定竟如此丰富多彩，喜乎？忧乎？

尽管如此，新的俄罗斯依然有着独一无二的教育制度，这是多轨而又系统的制度，它并没有完全抛弃苏联时代的教育模式。相反，在教育体系上它基本保留了过去的结构模式。无庸讳言，在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必然会对苏联时代的许多教育指导思想产生怀疑，乃至产生推翻重建的愿望，必然会出现一种所谓“过渡性”教育模式。作为一种转型文明的现象，这样一种“过渡性”教育理应引起世界其他地区的兴趣。对这一制度进行任何研究都必须深刻理解其精髓与基本特征，否则任何研究结果或改革建议都可能产生始料不及的消极影响。令人遗憾的是，“甚至到了今天，俄罗斯教育制度已对世界敞开了大门，也很少有西方研究人员从这一视角看待它，人们为调整改组俄罗斯教育制度而提出为数众多的方案和建议，却没有哪一个方案或建议提出来是为了让人们去关注其现有价值的。”<sup>①</sup>这样一种尴尬局面的出现，无疑与俄罗斯国力的衰退有直接关系。

正因为俄罗斯的教育变革和发展有着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因此，研究俄罗斯的教育，就必须坚持辨证的态度去解剖它，分析它，尽量减少某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用人文的、宽容的和理解的心态去看待他们的变化、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失败和成功。尤其是分析俄罗斯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变革过程，既要充分肯定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富有质量意识和集体意识的教育制度和思想体系，又要看到苏联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对个性和民主

<sup>①</sup> В·Д·沙德里科夫：《俄罗斯联邦教育的人本主义化》载《教育展望》（中文版），104期。

的压抑和排斥的缺陷。要辩证地认识苏联与俄罗斯两个时空范围中其教育间的关系，而不能因为苏联的解体，便将苏联时期的优秀教育思想和教育传统一并抹杀掉，当然也不能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简单评价新俄罗斯教育道路的选择，以为苏联解体了，其教育也便在政治上被资本主义“异化”或者“修正”了。对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教育道路的选择，尚不能简单地论定。解体后的俄罗斯教育的变革是进步还是退步，仅凭短短的十余年实践，显然是无法作出最后结论的。从俄罗斯 21 世纪初的教育发展趋势来看，俄罗斯教育的未来前景应该是明朗的、乐观的。

## 二、如何看待俄罗斯基础教育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变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教育必然要受传统的和变革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文化的影响，教育自在的变迁规律无法拒斥政治和经济对它的外在的影响。因此，研究一国教育现象，必然要建立在对其政治、经济形态及变迁脉络的研究基础之上。

同样，研究今天的俄罗斯基础教育，显然无法回避对俄罗斯社会的整体了解，尤其是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俄罗斯教育，必须客观地把握它那游移不定的表面背后的真实的生命脉络，更需要将它纳入宏观的动态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背景中去认识它，解剖它。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许多令世人预料不到的变化。90 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陷入政治动荡、权力纷争之中；民族矛盾频生，民族积怨骤发，经济下滑，民生困乏，社会产业结构失衡；文化事业仰仗传统底蕴而勉力维持其文明水平，但传统价值观体系已然进裂，新的社会主流信仰体

系尚未迅速建立起来。因此，整个 90 年代，俄罗斯几乎是一幅大国凋敝的景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教育改革之路可谓步履维艰。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庞大的高质量的国民教育体系，在失去其稳定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强大经济基础的支撑后，只能在苍白的变革口号声中苦苦挣扎。“一度具有最高威信的俄罗斯教育和俄罗斯科学继续毁灭性地跌落，而生活成功的标准越来越少地跟所受教育的程度及其质量挂起钩来”。<sup>①</sup>

1992 年 7 月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教育法》指出：“教育是指有利于个人、社会、国家的有目的的教学教育过程。受教育是宪法规定的俄罗斯联邦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之一。”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宣布教育领域为优先发展领域，并将教育的人道主义性质、联邦统一的文化空间、教育的自由与多元化、教育管理的民主化与自主性等，规定为国家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则。但在事实上，这些法律规定的内容却往往流于口号。

“教育优先发展”作为政府兴教兴国的决心，在政治和经济局势不良的现实背景下，只能是一种乌托邦。教育的优先发展、教师的至高地位、学生的健康发展、教育技术的现代化，都是需要现实的物质条件保证的。事实上，俄罗斯拮据困顿的教育经费如何能够保障其教育发展理想目标的实现呢？教师待遇的持续下滑，使得教师职业变得毫无吸引力，这种实际呈现出的局面显然无法实现“教育优先发展”的目标定位。

苏联时代的国民经济实力和国民收入水平虽然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但它还是比较充分地保证了苏联庞大的社会福利事业和

王义高：《从致叶利钦的公开信看俄罗斯教育的现状》，载《外国教育研究》，2000（2）

国民教育事业的稳定发展。而最近十年的俄罗斯，却在经历着经济之困、政治之困和信仰之困的同时，体验着教育变革和发展中的体制之困、教师之困、学生之困。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了令国人鼓舞的变化。教育上的变革决心与变革行动的距离也近了，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社会和教育变革的阵痛渐渐过去？

因此，无论是研究俄罗斯整个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总需要首先把握这样一种现实的和历史的背景，在这种动态的发展着的背景中才能寻找到其基础教育改革的真实形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无论其理论体系还是制度体系，其各个层面、各个部分相互之间都是紧密相连的，因此，研究俄罗斯的基础教育也离不开对其整个教育体系和制度的了解。在分析其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必然要联系到诸如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等其他与之紧密相关的教育组成部分。

在俄罗斯最近十余年的教育改革中最为彰显的该是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教学指导思想和教育结构的变化。而这些内容恰恰都是指向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整体的。这些改革的指向和趋势显然不能简单地定位于教育体系中的哪一部分、哪一个层级。教育管理体制中分权化和民主化，办学体制中的市场化和非国有化，教学指导思想中的个性化、人文化和人道化，教育结构的多层次化和多元化，这些变化趋势均呈现于俄罗斯教育的各个组成部分中，而不是仅体现于其中的某一个层面或某一个类型的教育。体现于基础教育领域如此，体现于高等教育领域依然如此，反映于正规教育是这样，反映于非正规教育也是这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特殊社会背景，使俄罗斯教育改革实际上是以一个整体的变革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因此，在研究俄罗斯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倘仅仅拘囿于基础教育层面，显然容易导致管状视野的研究。

## 第一章

# 从宗教走向世俗： 俄罗斯公共教育的生成

更让人遗憾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过封建社会，我们从来没有过文艺复兴。

——普希金

你就是我的权杖！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语……难以置信，说这样语言的民族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屠格涅夫

作为一个民族，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有着历经沧桑却一脉相承的教育发展历程。纵观俄罗斯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说，俄罗斯的教育与其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一样，走过了一条相当曲折的发展道路。20世纪俄罗斯教育的发展更是经历了发展的高峰和急遽

变革的阵痛。

## 一、俄罗斯世俗教育的起源

俄罗斯的教育文明应上溯到古斯拉夫人的教育历史。久居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东斯拉夫部族奠定了俄罗斯古代文化和文明的基础。

在原始公社制度时，东斯拉夫对儿童的教育具有原始民族的特点。那时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儿童直接参与氏族公社的全部日常生活以及适应其年龄的生产劳动来进行的。比如，参与各种劳动活动的仪式、庆祝会和祭祀典礼等。他们首先学会的是与崇拜大地、养育者、谷物、长者和祖先有关的仪式和习俗。

儿童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公社公共所有的，公社需要培养能秉持部落公共传统的新人。因此，儿童由公社共同养育，在 7~8 岁前由妇女养育，之后男孩由男人养育，女孩由妇女来培养。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开始出现类似青年之家的组织，其活动主要是为儿童举行成年仪式或进入下一个年龄段做准备。

当一夫一妻制出现，儿童家庭教育就自然取代了公共教育。以父亲为中心的家庭成为儿童进行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儿童在家庭生活的熏染中习得生活技能、道德标准，而手工艺的学习是由某些能工巧匠们传授的。公元 10 世纪，王公阶层出现了对其孩子进行专门教育的教学活动，包括教授军事艺术。

公元 8~9 世纪间，以基辅为中心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大的封建王朝罗斯。这为生成自觉的教育活动组织建立了政治的基础。在此后，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开始逐渐成为基辅大公国的国教，新文化的引入为教育的发展又奠定了文化的基础。公元 988 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基辅人受洗礼后开始建立教堂，并选择贵族子

弟在神甫门下读书。11世纪末，在基辅的一个女修道院曾设立了女学堂，教女孩子们阅读、书写、唱歌和缝纫。

11~12世纪，基辅公国出现了许多手抄本读物，其内容多为古代欧洲一些思想家的言论，也有一些基础性知识和普及性生活常识。这个时期的手抄读物中，大多富有教育意义，包含了培养儿童信教、孝敬父母等内容和长者的忠告以及对家长如何教育孩子的建议劝言。

在这一时期，基辅公国为了培养神职人员和国家需要的有学识的人，在修道院和教堂开设了一些带有宗教性质的学堂，但受教育者大多是显贵人家的子弟，教育的阶级分化是明显的。普通人家的子弟大多依然接受着家庭教育，而学习的内容无非是生产和劳动需要的技能，但也有少数的孩子有幸在神职人员中的“蒙师”那里学习阅读、书写和赞美歌。

蒙师早在12世纪出现在基辅公国，他们是在神职人员阶层中生成的一个有学识的施教群体。他们在担任神职的同时，还利用其他时间进行授学活动，赚取外快。教学地点一般在儿童的家中，教授孩子简单的阅读和计算，受教者大多是一般家庭的孩子。13~14世纪，蒙师教学活动较为普遍，甚至成为当时主要的世俗化教育教学形式。一个蒙师门下一般有8~12个孩子。这样的规模足可以使蒙师的教学场所成为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后来的蒙师阶层的构成有了变化，民间有学养的人也开始招收门徒，授业传道，他们当中专职者和兼职者皆有。在俗世中进行教学活动的蒙师现象自然有与教会冲突的地方，因为蒙师中的一些人是不信仰东正教的，在其教学中自然有贬斥教会的内容出现。但对于教会而言，他们也需要依赖蒙师阶层，毕竟宣扬正教的蒙师是有人在的。

13~14世纪，俄罗斯人与东部的蒙古鞑靼人进行了长期的争斗，鞑靼人一度成为统治者，在战争的混乱中，文化和教育遭遇

了许多挫折。15世纪，俄罗斯逐渐统一，宗教和民间的教育活动又逐渐活跃起来，除了修道院和教会以及王公政权建立书库、抄书和办学方面的活动外，许多来自平民的有学养者也积极地进行着在内容上有别于正教教育的教学活动，他们以异教运动所特有的自由思想、人道主义和唯理论区别于教堂的教育。

在世界文明史上，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是值得大笔挥洒的时代，现代文明开启于此。教育是文明的主旋律，因为它塑造着创造和演绎文明的主体——人。在那个时代，西欧国家大倡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沐浴着那里的人们。在波罗的海东岸，以莫斯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公国罗斯，此时虽已感受到来自西方的文化新风，但仍缺少一种文化社会运动的洗礼，它的文化和教育依然显得封闭和落后。

16~17世纪前半期，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处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统治之下，天主教会利用这一时机，企图同化居住于这块土地上的信仰东正教的人民。许多大地主接受了这种同化，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波兰的学校。但对于大多数信仰东正教的百姓来说他们自然反对这种信仰的同化政策。许多中低下阶层的人民开展斗争以抗拒这种同化，建立了特殊的民族宗教组织——兄弟会，并建立了与天主教学校相对立的兄弟会学校。出现于1586年的里沃夫学校是第一个乌克兰兄弟会学校，并拟订了学校的章程。作为一个出色的教育文件，这份章程被其他兄弟会学校广泛借用。在这份章程中，对学校的民主组织进行了规定：兄弟会的学校校长和教师由兄弟会全体成员选举产生，同时兄弟会还要选举两个督学作为学校的社会监督员，接受兄弟会的委托对学校的教育和教学进行监督，并协调关系；学生家长须与校长签订合同，在合同中规定彼此的责任和权利。章程还对教师的任职资格和素养作了明确界定。

兄弟会学校颇具现代教育的人本和人道精神 它是开放的 接受各阶层的儿童入学，对孤儿实施免费教育。学校教学制度是严谨的，教学过程的规范性在章程中都有反映。教学内容以语言习得为主，斯拉夫语占主要地位，同时也讲授希腊语和拉丁语、语法、修辞学、辩证法和算术、几何、天文以及音乐等基本知识。此时，兄弟会学校教育的民主特点已有所显现。

17世纪，特别是后半期，俄罗斯教育出现了大的进步。在这一时期 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之间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已经初显。这意味着教育上的政治斗争公开化了，而这也恰恰证明教育已经是一种受社会关注的活动了。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很多学校，不是由教会倡议建立的，而是由民间或政权倡议建立的。由于宗教学校与世俗学校的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的差异，自然使彼此之间形成对立。世俗的学校力图介绍来自西方的新思想，而东正教会学校则极力保持其宗教精神，激烈地反对教授拉丁语和语法、修辞学、算术等世俗科学，而只要求诵读圣经。

18世纪，西欧诸国早已完成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而且工业革命也已经推动其社会发展的车轮飞快地转动起来。而此时的俄罗斯还沉浸在封建帝国发展高峰期的陶醉中。18世纪初，彼得一世在对外战争中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建立起俄罗斯帝国。为了提高生产力和巩固国防力量，彼得大帝在文化、科学和技术领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出版刊物、报纸、译著，建立科学院，开办首批世俗的国立学校。数学与航海学校于1701年在莫斯科开办，这是欧洲第一所实科学学校。这所学校具有中等专业教育的性质，它在18世纪前半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每年招收学生200名，有时多达500名。学校开设包括数学、天文、地理以及其他一些专门学科和世俗科学。18世纪初，政府曾试图建立国立普通学校。1714年政府给各教区发布了关于开办计算学校的

命令，1718年开办了42所计算学校，开设阅读、书写、算术以及代数、几何、三角等课程。除了开办世俗学校，在宗教改革的基础上，政府对宗教学校也进行了改造，建立了初级主日学堂和神学堂，课程中普遍设有普通教育的内容。此时的世俗教育具有贵族倾向。由于此时的俄国仍然是农奴制国家，大多数平民是无能力也无权利进入为数不多的公共教育机构的。

到了18世纪中期，普通学校的等级性更为突显，为贵族子弟开办的寄宿学校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士官学校是专门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具有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特点的学校。第一所士官学校于1731年在彼得堡建立，分四个年级，每一个年级修业2~4年，总修业年限为10~12年。在前半段时间里主要学习普通课程，包括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在高年级开设专业课程。俄国18世纪中期形成的等级教育制度具有以下特点：每一所学校都是为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培养人才的，各阶层学校的教学大纲是不同的。

1755年，在俄罗斯伟大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М.В. ПАМАНОВСКИЙ 1711~1765年）的直接参与下，在莫斯科开办了莫斯科大学。大学附设两所文科中学（ГИМНАЗИЯ），一所面向封建贵族阶层，一所面向农奴之外的各个阶层。文科中学以语言学习为主要内容，开设俄语、拉丁语和一门外语，也开设数学和历史。1758年，莫斯科大学又在喀山创办了另一所文科中学，其培养目标就是为莫斯科大学输送生源。在30年间，莫斯科大学一直为该中学提供教师、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和设备。

莫斯科大学创办的文科中学对俄罗斯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是从这里跨入大学校门，继而走向名人的殿堂。

1762年，在法国居住的俄罗斯著名教育家У·别茨科伊（И. БЕЦКОВИЧ）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招募回国。1764年他向叶氏提呈了

关于俄国儿童教育事业总体改革的报告。同年，该报告冠以《男女青年教育的基本制度》一名，以法律形式公布。报告提出：俄国必须通过建立寄宿的教育和教养机构为各阶层培养“新型的人”；儿童应从5~6岁开始接受这些机构的教育，直至18岁；寄宿学习期间应与周围隔离，避免受到平民的腐化影响。

作为一个受西欧文化长期熏染的启蒙思想家，U·别茨科伊从人道主义层面提出了教育的平民化思想。他认为，作为培养和塑造“新型的人”的教育，应该人道地对待农民和公正地管理国家的贵族阶层以及其他从事手工业、商业等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应该培养在寄宿制学校中就学的儿童具有劳动的兴趣和爱好，并成为具有怜悯心、同情心的有教养的人；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避免用强迫的方式，禁止体罚。可以说，U·别茨科伊是俄罗斯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奠基者，为日后的俄罗斯公共基础教育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

## 二、俄罗斯公共教育的生成

18世纪末是俄国形成国家公共教育体系的重要时期。1782年，在彼得堡建立国民学校委员会，但这是一个纯粹的官僚机构，并没有非政府人士的参与。

1786年，俄国政府颁布了由该委员会制定的《俄国国民学校章程》，这被看作是俄罗斯历史上国民公共基础教育的第一份法规。该章程允许在城市开办二年制的初级国民学校和五年制的中心国民学校，在县镇开办初级学校。中心学校开设阅读、计算、书写、圣史、书法、图画、算术、历史、地理、语言、几何、物理、自然史和建筑等课程。初级学校开设中心学校的低年级课程。国民学校的物质保障和领导管理由社会救济厅负责。地方则直接由

自治当局管理。

到 18 世纪末 俄国开办了 315 所初级学校和中心国民学校，学生总计 2 万人，教师 790 人。显然，这样一个数目，对于这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教育需求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俄罗斯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与拿破仑之间进行的规模巨大、影响也大的战争等。这些事件在动摇着俄罗斯封建社会的铁板一样的制度。亚历山大一世即位后，按照西方的模式，将国家管理体制——参议会改为负有各种行政使命的各部，并于 1802 年建立了国民教育部。1803 年，国民教育部颁布《国民教育暂行章程》（又译为《公共教育的基本规定》），第二年又颁布了《大学附属学校章程》。这些文件规定了由四类学校构成的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四类学校为教区学校、县立行政管区学校、文科中学和大学。

教区学校可以在城乡所有教区设立。该类学校一是培养学生升入县立学校，二是使下层平民阶层的孩子掌握一些宗教和读、写、算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对这部分学校，当局不予拨款，其经费主要靠社会救济厅募集的捐款维持。县立学校由于数量较少，其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有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同时在地方税款中也有拨付。文科中学每省一所，以主要中心学校为基础建立，修业年限 4 年，受教者大多为贵族和官吏的子弟。文科中学所设课程较为广泛，包括文法、语言、统计、哲学初级、文艺初级、数理、工艺等，其中不设神学。文科学校的经费全部由国家承担，其原因不言自明。国民学校委员会在 18 世纪 80 年代制定的教学方法被引入学校，教师按照《国民学校教师指南》进行教学活动。在 1804 年的章程中，仍视教师为官吏，严格按照既成规章行事，教师的创造性大受限制。

19 世纪中前期，俄罗斯出现比较明显的城市化迹象，城市人

口增多，加之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萌芽，使学校数量增长速度加快。1812年，与拿破仑进行的战争前夕，俄国共有 47个省区，几乎每一个省区都设立了文科学校、县立学校和初级教区学校。

这些新确立的学校制度，有着明显的模仿痕迹，其中来自法国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如学区管理体制就是直接模仿法国的学区管理制度而来。根据章程 俄国在教育行政上被划为莫斯科、喀山等六个大学区 每个大学区由学区中的大学负责管理。为此 还在喀山等三个尚未有大学的学区开办了大学。在这种学区制管理模式中，大学既是各区的教学和学术机构，同时又是教育管理机构。这种行政与学术和教学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使官僚体制得到一定的改善。

在学区制管理系统中，从帝国政府到教区学校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隶属关系。教区学校隶属县立学校派出的巡视员，县立中学隶属文科中学校长，文科中学隶属所在学区的大学管理，而各个大学则由帝国派出的大学区督学监督，六大学区督学直接向沙皇帝国政府负责。由此确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公共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在这一时期，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宗教系统与世俗当局间既有严重的对立 也有相互利用的空间。宗教学校的发展与普通学校对宗教的态度往往取决于这种关系的发展状况，当社会思想进入自由活跃期的时候，当局总会想起利用宗教思想来统一和束缚它的蔓延。1817年，国民教育部改为宗教事务与国民教育部，并规定：依据神圣同盟的决议将国民教育建立在笃信宗教的基础上。这种变化一并反映在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所有学校一律开设“读经”课，禁止自然科学和自由思想的讲授和传播。

19世纪 30年代，欧洲社会发生了一系列起义和群众运动。面